

解读夏目漱石作品中家的成像

舒斌 610101 四川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日本的家的制度由明治民法制定，其诞生强化了亲权，生成了新的亲子关系，年轻人想摆脱家庭的意识愈发增强。夏目漱石是当时关注该现象的作家之一，他的最大特点在于采用低音部构成家的旋律，在和父母共有的大家的崩溃中常夹带着自己新家庭的再建。本论文着眼于家庭关系及病死、战争、国家、近代等，通过3部作品来解读夏目漱石作品中家的成像。

关键词：母亲的不在；孩子的不在；父权；家族国家主义；离散

夏目漱石本名夏目金之助。夏目家本是名族，生在这种家境的金之助的家庭构成本来应该不寂寞，可事实上他的幼年、少年、青年，直至中老年时代，家庭却并不十分幸福。这些贯穿于他的作品当中，也投射出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家庭成像。

一、夏目金之助的家

夏目漱石断奶前一直被寄养在旧工具店，3岁时又当了养子。养父盐原和他的妻子御安一开始还很爱金之助，后来夫妻关系恶化，最终离婚。本来很吝啬的盐原夫妇却给了金之助“宽容”的爱，然而那不过是期待回报的爱而已。尤其是御安，她想把金之助占为己有的异样的爱引起了金之助的反感。随着这种反感的加强，金之助也越发的任性，他觉得被爱是理所当然

收稿日期：2008-12-27

作者简介：舒斌（1972-），女，四川广汉人，日语教育学硕士，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日本近代文学研究。

然的。

离婚后，御安被赶出盐原家，再婚后得到新任丈夫、女儿和女婿的善待，但因为女婿的战死，她的幸福也没能持续多久，于是她又想依靠金之助。盐原也跟离过婚的女人成了家，后来受欲望驱使，无视养子关系解除的协议，声称不会让金之助做没有人情的事，伸手向留学归来的金之助要钱。

金之助7岁时回到老家，一段时间内曾保留了盐原籍。对老家的人他大都冷淡，令他怀念的只有母亲和长兄大助。关于母亲，在《玻璃门里》有记述，而其他作品中母亲的不在几乎成为一种模式。对于父亲，金之助没有好感。不论是生父还是养父，他都没有从他们那儿得到孩子应得的待遇。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作品中父亲的不在也很引人注目。

金之助有3个哥哥。长兄大助对他来说犹如父亲。虽是长男，可是因为病的缘故，他想把自己实现不了的继承人的角色托付给弟弟。但是最终继承夏目家的是三哥直矩，直矩在父亲死后不久就变卖了家产。对直矩放荡的生活，金之助只有轻视和厌恶。

漱石后来跟中根镜子结了婚。新婚初始漱石就对妻子宣布，因自己要搞学问而无暇顾及她。虽然这样，但是漱石的确曾经爱过妻子。使两人关系发生重大改变的是漱石的留学生活。忍受着作为日本人的自卑和孤独的漱石，一直企盼着家人的来信。然而，尽管他寄出了很多信件，镜子的回信却很少。不仅如此，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镜子也很少按漱石说的去做。归国后由于镜子的歇斯底里和漱石的神经衰弱，夫妻关系一度出现危机，甚至到了分居的程度。^[1]

漱石和其夫人的分歧究竟在哪里？两人成长的环境不同，受教育的程度也不一样。喜欢汉学的漱石不用说没有拒绝儒教的思想。在他心目中，当然有妻子必须服从丈夫的观念。而中根镜子却是呼吸着自由的空气长大的。两人的个性各自不同，相互撞击，这正是明治时代夫妇悲剧的根源。从老家和养父母家都没有得到关爱的金之助，在成为作家漱石后并没放弃从妻子那儿得到爱的愿望。但是，就连后者也没能如愿以偿，漱石被推到了爱的边缘。父爱的丧失、对母亲的思念、哥哥们的早死、对家的不留恋、对嫂子的恋情，这些都在作品的家中投影出来。

二、《那以后》

《那以后》发表于1909年。主人公代助如果满足现状的话，或许也该是个幸福的人。代助的家中有父亲和哥哥一家人。父亲是实业家，乍看像是重诚意的人，可实际上完全是一个实利主义者。代助带着书生和老佣人另居一处，每月的生活费由父亲提供。父亲在向高等游民代助提出工作一事却遭其拒绝后，又抬出结婚的话题。

就在这时候，代助学生时代的好友平岗带着妻子三千代回到东京。与其说想帮助经济上有困难的朋友，不如说想为三千代做点什么，于是代助打算不再得罪父亲，可是又因为讨厌父亲的伪善，他决定让跟父亲住在一起的哥嫂帮忙。哥哥大都不在家，身为长男的他既是父亲的帮手，也是代言人。^[2]代助很敬佩哥哥，却又不是可以推心置腹的那种。这样的兄弟关系在漱石作品中并不少见。与哥哥相比，嫂子梅子却对代助抱有好感。梅子是一个兼有明治和现代两种风格的女性，她在父亲和兄弟俩间常常起缓和剂的作用。在缺少母亲的这部作品中，嫂子可以说就是母亲或者至少是一种母性的象征。可是，梅子最终没有作为虚拟的母亲而仍然以儿媳的身份屈从了父权。

代助和三千代相识是因为以前和三千代的哥哥菅原是好朋友。兄妹的故事在《三四郎》等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兄妹俩怀着对彼此的爱共同生活，这并不符合近代家族像的常规。菅原死后，代助介绍朋友平岗和三千代结婚。但是后来平岗和三千代的关系因孩子的死而出现裂痕。漱石虽然说过“家庭一词让人联想到少男少女”，可在作品中却常常不设定孩子的存在。其理由不知是出于对孩子的厌倦还是对孩子诞生的恐怖。石原千秋把孩子的不在，尤其是男孩的不在视为回避长男这种记号的行为，如果定义“家庭是人类再生产的场所”，那么不把孩子带入家庭或者是漱石拒绝社会性的一种表现吧。

随着自己结婚一事的进展，代助开始把和三千代的事看作天意。代助为什么会如此渴求三千代呢？其中当然有出于同情想把她从不幸中解救出来的男人的责任感，可是也不难看出代助想借助三千代从高等游民返回到常人的心态。被逐出家门的代助终于决定向三千代告白。被自然委以的责任感，帮助他走出了为了不失去面包而一直小心维持着的家庭葛藤。对于代助的表白，三千代也表现出了勇敢的一面。然而，对两人而言，并非只要有心就能

再建一个家庭那么简单。平岗的家庭因为代助和三千代的恋情而走向实质的崩溃。首先考虑到自己名声的平岗不打算容忍两人的爱。由于他把一切告诉了代助的家人，代助从此失去了家里的经济援助，三千代的病重也阻碍了家庭的再构成。即便三千代康复，也不能断言平岗就不会因家庭被破坏而提出诉讼。^[3]代助在作品最后红色的世界中接近疯狂。两人的后话在下一部作品《门》中以在崖下过着寂寞生活的宗助和御米的姿态出现，这又是一个缺乏社会性的家庭。《那以后》是一部叙述发生在大家与小家夹缝中的故事的典型作品。

三、《心》

《心》创作于1914年。这部作品出场人物相对较少，对家族整体关系的描写也不多。但是，正因为它有虚拟家族的色彩，在考察漱石作品的家的成像时才不可缺少。

先生的家有双重含义，一是乡下传统的老家，二是后来和小姐静组建的家庭。失去双亲的先生由于家产被父亲深信的叔父掠夺而失去了对家的依恋，同时对人也产生一种深深的不信任。这种怀疑心无疑是现代人的标志之一^[4]。

比起继承家业，先生更憧憬自由。先生的这种心理在崇拜先生的“我”身上有，在《三四郎》的主人公三四郎身上也可以见到。结婚、继承家业、维持家业再传给下一代，这种生活形式对年轻人而言已显陈旧。这种居家意识的低下使得家的实体走向崩溃。离开老家的先生，借宿于太太和小姐的家中，后来成为小姐静的丈夫。太太和小姐静是军人的遗族，卖了以前的大宅屋后经营着民宅。太太很独断，认为女儿结婚的事，不用说亲戚，连本人也不用征求意见。当时的社会之所以能容忍这样，无外乎其“未亡人”的身份。家长就是父亲，父亲死了，母亲才可能成为亲权的掌握者，代行父亲的权利。

先生的好友K无心成为养父家的继承人，为走“自己的路”连本家也得罪了的K最终被驱逐。也许是真宗寺出身的缘故，他对自己非常严格。受先生相邀同处一个屋檐下的K也对静产生了好感。当他讲给唯一的友人先生听时，却得到先生一句“精神上没有上进心的人是混蛋”。在先生和静的关系公开时，他留下“自己意志薄弱，最终没有希望而自杀”的遗书选

择了死。K 的死其实也是受先生对父权的迷恋所排斥的结果。

先生无法抹去 K 自杀的阴影。听到明治天皇驾崩的消息，他感悟到了明治精神的终结，就算继续活下去也只是一种过时。先生对妻子静表露出为明治而死的态度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伊豆利彦解释到，先生心中的明治精神，就是和 K 同处时追求自我的精神。^[5]

先生和静之间也没有孩子，他选择的死直接让他们的家庭走向解体。对于先生的死，也有人指出是因为“我”这个他人的侵入。“我”也是对家毫无眷恋的青年。一向把学问和大学看得很淡的“我”，从以“我”为荣的父母身上看到了乡下人的土气。“我”有兄弟，却又如同没有，因为在九州工作的哥哥和远嫁的妹妹都不轻易回家。“我”的父亲患了和天皇同样的病，每天通过报纸追踪天皇病况的父亲，在对死无比恐惧的同时，又为无法追随天皇而去而显示出作为一个忠实臣民的内疚。“我”的家和先生的家庭有着类似的地方，而明治政府强调的家族国家主义的影响便是其中主要的一个方面。

四、《道草》

《道草》于 1915 年写成。因为有主人公健三的金钱做向心力，家中的一族，包括养父母，围绕着他铺开了一张巨大的亲族网。

作品中的健三和御住以漱石夫妇为模特，可是两人的关系比起充满危机的漱石夫妇多少有些缓和。夫妻的对话和心理可以说是《道草》中最有趣的看点。首先，双方关于人类和夫妇的理论永远无法统一。御住总是强调如果健三再对自己好点，内心还要求健三要和自己的父亲一样伟大。健三则认为妻子应该服从于丈夫。

这一基本的观点导致两人在教育、论理、金钱以及孩子等很多问题上的分歧。御住无法理解丈夫，而身为学者的健三则认定小学毕业的妻子是脑子不好的女人，结果总是不能与御住站在同一起点上。两人对立的根本原因，实际也是构成看重实用价值的生活者和脱离实用性而追求精神价值的知识者的断层的因素。两人的对立因为健三过去的养父岛田的出现而激化。御住对健三凡事独断的做法颇为不满，作为妻子，她至少想拥有管理家财的权利。而没有得到过父母兄弟的爱健三渴望妻子能爱自己。另外，讨厌当父亲的健三对孩子和御住怀有一种忌妒的心理，他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御住能对孩

子倾注无私的爱。

和健三夫妇相比,《道草》里还刻画了一对个性化的夫妇,那就是健三的姐姐御夏和她的丈夫比田。两人是表兄妹,按理说应该比平常的夫妇更加相互敬爱,可实际上却形同路人。比田丝毫不关心生病的御夏,整天在外浪荡。御夏对丈夫也不闻不问,她的这种“宽宏大量”,被亲戚们视作是“孝敬”丈夫,妻子的个性化使得这组夫妇像也充满了个性。读者不禁会设想;哪怕健三夫妇能从互不干涉的比田夫妇身上学到一点点贤明的相处法,世界会大不一样。姐姐御夏和健三的维系点只在零花钱上。健三虽说曾受到过姐姐夫妇的照顾,可自小就对他们难有好感。在他眼里,姐姐一旦剥去表皮就和没受过教育的人一样。不仅对姐姐,对哥哥长太郎,他也从来不积极地评价。这个哥哥是以漱石的三哥为原本,他因为父亲死后不久就变卖家产和结过三次婚而常常受到批判,可是看看他的成长经历就会明白,他放荡的行为其实跟所受的溺爱不无关系,之所以结三次婚,也是因为当初无法选择自己喜欢的人。

姐姐和哥哥都不能说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三兄弟中只有健三有出息。于是亲族都向健三靠拢来,这似乎也是人之常情。养父母表露出的关心成为健三夫妇间一个大的话题。再婚的岛田靠补贴生活,养母御常也再度结婚而且得到女婿的善待。不幸的是,岛田后妻的女儿得了病,而养母御常又因为女婿的战死眼看就快失去经济保障。此时,尽管养子协议已结束,可两人都想再次依靠健三。没有孩子的夫妇的离婚——没有比岛田夫妇家庭的解体再简单的形式了。

《道草》这部作品就是利己主义者的大汇合,在明治31年亲族相互扶养的义务被明文化的背景下,这些都可以理解。尽管是次子,却不得不独自承担起家长的义务,这或许也是家的重压赋予健三的使命。

五、结语

漱石作品中的家的成像,用一个词概括就是离散。读者可以感受到的,除了父母的不在,就是年青一代与父母的横沟,年青一代对家的意识的淡漠,兄弟间的冷淡,还有家庭里孩子的缺少以及夫妇关系的不圆满。山下悦子认为,这种家的成像其实是时代风潮,西欧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和个人生活经历的复合物。养子制度,漱石的养父母的离婚和再婚,《那以后》中的

代助和三千代向《门》中宗助夫妇的过渡，《心》中的未亡人所处时代的极其意外的有权者的母亲像，无一不和当时的法律制度有关。明治时代让人想到日俄战争和日清战争，其中家族国家主义的意念与儒教社会的共振，尤其在日本进一步得到深化。另外，在漱石作品中，家的崩溃过程中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个体的问题，其中并存着应该肯定的个人主义和必须否定的自私主义。

注释：

- [1] 平岡敏夫編，「日本文学研究大成夏目漱石Ⅱ」，日本文学研究大成刊行会，1991，121-130 ページ。
- [2] 石原千秋，「長男の記号学」，见『漱石研究』，東京：翰林書房，1995年第5号，83-87 ページ。
- [3] 小森陽一，「〈ゆらぎ〉の日本文学」，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8，73-77 ページ。
- [4] 相原和邦，「漱石文学 - その表現と思想」，東京：塙書房，1980，42-44 ページ。
- [5] 伊豆利彦，「漱石と天皇制」，東京：有精堂，1989，65-67 ページ。